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汤金霞, 梅阳春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 翻译生态学; 翻译伦理学; 译者地位;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2) 01-0070-05

学科发展如果“各自为政地进行探索,往往影响总体研究的成效”^[1],因此,许多学科的发展往往借鉴其他学科的发展成果,翻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纵观翻译历史,翻译学在发展过程中借鉴过文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便是翻译学分别结合生态学和伦理学发展的结晶。生态学和伦理学虽为不同学科,但二者研究领域有相当的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思想用拟人的形态解释天变和人事的关系,将人类当作自然界的一个有机构成,着眼于他们之间的相通相应,从伦理的视角观察自然,“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2]。尽管自然与人类,生态与伦理各自独立发展的二元对立思想在西方世界盛行多年,但随着“人类对自身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一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政治伦理观”^[3]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并蔚然成风,并最终导致了生态伦理学在西方世界的建立。

翻译生态学“在中国学者提出之前是‘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4],翻译伦理学源于西方,于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进国内学界。与生态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类似,翻译伦理学和翻译生态学之间也有共性和差异性,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明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仅可以完善翻译生态学理论(翻译

生态学诞生于翻译伦理学之后,其发展借鉴了西方翻译伦理学理论的成果),还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透视西方翻译伦理学理念,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伦理学。

一、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各自赋予译者的地位

“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4]8}，“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翻译界的永恒话题之一”^{[5]10}。对于这一点,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也不例外,本文拟对二者赋予译者的地位做对比研究。

翻译生态学对译者的定位主要体现在该学科代表人物胡庚申所著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第四章中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译者主导”^[6],以及他关于翻译生态学的论文当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7]。翻译生态学“从译者的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

‘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8]总而言之,翻译生态学“将活生生的、感性的、富有创造性的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使翻译理论建立在真实的、具体的译者基础之上……并以译者为终极关照。”^{[8]5}

翻译伦理学对译者的定位主要体现在这一学科的代表人物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论文“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中的译者誓约中,具体如下:

1. 我宣誓竭力遵守此誓约
2. 我会忠于职守,尊重翻译职业发展的历史,与译界同仁共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并将其传于后进。我会按质索酬,竭尽所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3. 我将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尽量消除因语言障碍导致的误解,最大程度地促进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
4. 我郑重承诺我的译文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原文。
5. 我会尊重译文读者,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
6. 我发誓,我会严守客户的秘密,不会因个人私利泄露客户信息,我郑重承诺客户的要求开展翻译工作,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译文。
7. 我会客观准确地审视自己的能力,不接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任务。
8. 遇到客户要求不能在翻译中得到满足的情况时我会通知客户,通过第三方仲裁解决我们在翻译问题上产生的争议。
9. 我将竭尽全力学习语言学,科技学等与翻译相关的各学科领域内的知识以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9]153}

二、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的类同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在意译者定位上有一些类同,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

1. 职业译者
-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胡庚申认为:“自从受‘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的翻译观流行近一二十年来……对译者中心地位和主

导作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译者的职业形象和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5]12},可见他论述的是以翻译为职业,以出版译作为目的职业译者,而不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偶做翻译的人。切斯特曼也将译者划分为“职业译者和偶尔从事翻译活动的人”^{[9]146},他的翻译伦理学论述的也是职业译者。将译者划分为“职业译者”和“偶尔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并以职业译者为论述焦点可以避免关于“何谓译者”的无谓的争论,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在翻译活动日趋职业化,翻译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日益显著的今天,再将翻译视为“一种学者书斋中的消遣和文人笔下的游戏”^[10]的译文产出活动并加以论述已经没有意义。

2. 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
- 翻译环境即胡庚申所称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关联互动的整体”^{[11]16},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12]92}。胡庚申认为译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全部和“所有因素”^[13]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不同的翻译情境下,构成翻译环境的各个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某种情境下,原文可能是翻译环境中的典型要件;而在另一种情境下,作者、译文读者(译者自身除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是第一个阅读译文的读者)委托人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翻译环境中制约译者的最主要因素。当原文是翻译环境中最制约译者的因素时,译者就必须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同样,假如翻译环境中的读者因素比较突出,译者就必须适应以读者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是翻译生态学中一个亘古不变的硬道理。翻译伦理学同样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译者九条誓约中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条款约分别讲述以“语言、原文、译文读者和委托人”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对译者的制约或者说译者不同翻译境遇下对以其中某个因素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的适应。

3. 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
- 由于译者不可能在同一个翻译境遇下给构成翻译环境所有因素分别给予完全一样的待遇,译者只能以适应翻译环境中最突出要素为主,同时适当兼

顾其他要素的方式产生译文。切斯特曼要求译者承诺译文“恰到好处”地再现原文,但何为“恰到好处”对译者是一个艰难的权衡选择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原文,也涉及到译文读者以及翻译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如果原文是决定译者翻译活动的唯一要件,译者用不着承诺“恰到好处”地再现原文,可以承诺“惟原文马首是瞻”,但原文及其背后的原文作者不是构成翻译环境的唯一因素,译文读者同样也是构成因素之一,其利益也必须得到译者的尊重,即便原文是翻译环境中最突出的因素,最需要译者适应,译者也需要适当兼顾译文读者的利益,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毕竟译文是否能够被译文读者接受以及接受程度如何是决定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译文“恰到好处”地再现原文说明翻译伦理学把译文看做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翻译生态学更是主张“译者要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11]49},并以此方式产生译文。但如何适应多维度?对翻译环境中的每个要素给予什么程度的适应?只能靠译者去权衡。

4. 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都把译者看做翻译活动的中心,并以译者为切入点论述翻译。在“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一文中,胡庚申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视角论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5]10-12}切斯特曼的“圣哲罗姆誓约”中的全部九条誓约分别讲述译者对翻译职业、翻译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原文、译文和译文读者、委托人、以及译者自身的承诺,每一条都是以译者为起点。显而易见,翻译伦理学也视译者为翻译活动的中心。不过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对于“中心”阐释有所不同,翻译生态学主张的“中心”不仅指译者地缘上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更强调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导,“控制着产生译文的整个符号操作过程”^[14],是翻译的最终决定者。翻译生态学视译者为翻译活动中心,目的就是突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并力图从译者为中心的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翻译伦理学视角下的“译者中心”似乎只是个地缘概念,并不强调译者对翻译过程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圣哲罗姆誓约”中的九条译者誓约论述的只是译者对翻译环

境中其他构成因素的义务,只字不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应享有的权利,显然,其所宣扬的“中心”不含“主导”之意。

三、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的差异

尽管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在对译者定位上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毕竟分别从生态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论述翻译,论述角度的不同使得二者在论述译者的视角、翻译环境对译者制约的程度、译者对待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1. 论述译者的视角

与翻译伦理学相比,翻译生态学论述译者地位的视角要丰富得多,它分别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视角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翻译生态学所称的“中心”不仅仅是个地缘概念,更是个权利概念,确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自主地适应翻译环境和选择译文。从“圣哲罗姆誓约”的9条誓约中不难看出翻译伦理学只是从“诸者”关系层面论述译者地位,其所称的“中心”只是地缘概念,不是权利概念。“圣哲罗姆誓约”是译者对翻译“诸者”的一一承诺,这说明译者受翻译“诸者”的共同委托执行翻译任务,翻译“诸者”以译者为中心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但“圣哲罗姆誓约”论述的只是译者对翻译“诸者”的承诺,丝毫不提翻译“诸者”对译者的承诺和译者享有的权利,说明翻译“诸者”赋予译者的这个“中心”不是决策的中心,只是一个地缘上的中心。

2. 翻译环境的制约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的区别还体现在翻译环境对译者的制约上,两者都认为译者要适应翻译环境,受翻译环境的制约。翻译生态学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环境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翻译环境不包括译者,是以原文、原语、译语、作者、读者、或委托者当中的某一个为典型要件的环境,这个翻译环境选择译者,译者只能适应这个环境;第二个阶段的翻译环境以译者为典型要件,“这时的译者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

(a translator),而已经是一个‘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或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的’特定的‘译者’(the translator)”^{[12][93]}。这时的译者不是一味受翻译环境制约,而是以翻译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具有很强的主动性。翻译伦理学没有对翻译环境做阶段性划分,它所称的翻译环境的构成要素不包括译者。这样的环境只强调“译者在翻译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字不提译者应享有的权利,也不提与翻译相关的其他主体应承担的责任”^[15]。译者的地位远远低于翻译环境的其他构成要素,译者在这样的翻译环境中有的只是适应甚至屈从,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的空间。但在翻译生态学领域内,翻译环境制约译者,但译者也是翻译环境的构成因素,也可以成为翻译环境中的典型要件制约其他构成因素,有足够的空间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

3. 译者对待翻译“诸者”关系

对翻译环境及其构成要素的界定的不同导致了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和翻译“诸者”关系定位的不同。翻译“诸者”指“作者、读者、委托者、评论者、译文使用者等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其他人员”^{[15][13]}。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译者在同一个翻译情境下没必要也不可能平等对待翻译“诸者”,只能采取以适应翻译环境的典型要件为主的多维度适应方式。翻译“诸者”在翻译环境中地位平等,都有可能成为翻译环境的典型要件,有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也有以译文读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环境,但典型要件究竟是翻译环境构成要素中的哪一个?不是由该要素本身决定而是由译者决定。就翻译过程而言,译者的这种地位和功能是翻译“诸者”没法替代的。虽然作者、读者等“诸者”会对译者的翻译选择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这些“诸者”不是翻译过程本身的操作者,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翻译活动,只能由译者权衡他们能否成为翻译活动的典型要件。在翻译伦理学视角下,译者无法这样对待翻译“诸者”,因为译者的地位低于甚至是远远低于翻译“诸者”。翻译伦理学赋予了翻译“诸者”向译者提出要求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译者向这些“诸者”提出要求的权利,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明显低于这些“诸者”,他像个没有主见、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没有权利区别对待翻译“诸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诸者”无不想通过译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利益,他们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译者如此这般怎么能解决他

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一遇到没法解决的问题和冲突,译者只能通过“第三方仲裁”来解决了。

4. 译文的产出方式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和“诸者”关系定位的不同导致了彼此领域内译文产出方式的不同。翻译是各“诸者”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斗场,每个“诸者”都希望译者适应他并选择最有利于他的翻译策略,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翻译生态学奉行译者中心、译者决定权不受干预的理念,主张翻译操作过程中的一切适应与选择都由译者自主作出决定和实施操作,译者是产生译文的主宰,他以翻译“诸者”中哪个为翻译环境的典型要件并选择适应他来产生译文全由他自己决定,即使他的选择可能产生失误,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诸者”也不可对其进行干涉,只能到翻译过程结束或译事活动的完成才由“自然”^[16]即翻译生态学所称之为“翻译的生态环境”作出选择和仲裁。因此,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不会出现译者产生不了译文的现象。但在翻译伦理学视角下,这种现象就有可能发生,因为在该视角下,译者的“中心”地位不是权利的中心。虽然翻译伦理学主张“当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者’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时,译者要尽力调解,促使他们之间达成谅解”^[17],但是一个在翻译中没丝毫权利的译者怎么担当得起矛盾调解员的重任,“诸者”又怎么会听从一个没有地位的主体的调解和仲裁。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翻译新论与实践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9.
- [2] 袁梅. 中国哲学传统与当代生态伦理观的育成 [J]. 求索, 2010(6): 25-127.
- [3] 金纬亘. 反思与超越: 生态主义伦理观的论争及其启示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3): 65-68.
- [4]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J]. 译论研究, 2011(2).
- [5]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J]. 中国翻译, 2004(3).
- [6]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83-117.
- [7] 许钧.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 [J]. 中国翻译, 2004(6): 40-43.
- [8] 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 [J]. 上海翻译, 2008(2): 1-6.

[9] Chesterman A.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1(2).

[10] 吕俊 ,侯向群. 英汉 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1: 207.

[11] 胡庚申. 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3).

[12]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 [J]. 四川外语学
院学报, 2008(4).

[13] Gutknecht C, Rolfe L J. Translating by Factors [M].
Binghamt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6
273.

[14]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 2000: 127.

[15] 梅阳春. 翻译的承诺伦理之透视 [J]. 江苏科技大学学
报, 2010(2): 74- 78.

[16] 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tology,
2003(4):283- 291.

[17] N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8.

Translation Ecology VS Translation Ethics

—— from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s Status

TANG Jin-xia, MEI Yang-ch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aizhou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ecology and translation ethics hav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which in turn lead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explorations of the translator’ s status. The similarities lie in that both theories elaborate on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both argue that the translator is at the center of a translating activity; the two theories also hold that the translator’ s activity is restrict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translating activity takes place and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the final product of the translator’ s weighing and balancing. The differences are in that the two theories elaborate the translator’ s statu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hold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translator is confined by the translating environ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other agents in his translating activity, and on how the final translation is produc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ecology; translation ethics; translator’ s status; contrast